

opusdei.org

「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了圣施礼华。」

这是对纳瓦拉大学前校长方济各·庞兹的访问，他最近刚庆祝了他的百岁嵩寿。

2020年8月27日

方济各·庞兹·彼拉菲塔（1919年，生于韦斯卡）刚满100岁。他无疑是 *Nuestro Tiempo* 杂志采访过最年长的一位，他身体健康、头脑清晰、和蔼可亲，让人印象深刻。他领带打得相

当漂亮，跟我说：「先让我打印几份档案。」然后走到计算机前，轻松的处理完毕。「再让我看看这封电子邮件，」他补充一句，就是拒绝坐在屏幕前的椅子上。

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名大学生。「这是一辈子得面对的现实！」他声音低沉。的确，在他100岁时，他依旧在学习，想跟上他领域的进步。他曾发表了170多篇研究文章，6篇学术论文，4本学生手册和许多与大学教育相关的出版品。也写了一本回忆录，《我与主业团创办人的相遇》（2000年），书中他详述自己记忆中的圣施礼华。

今年你的生日，最让你兴奋的是什么？

在我100岁生日的庆祝中，有很多感人的表现，我很难特别强调是某一个。也许是Grand Chancellor的问候和拥抱。（去年夏天主业团监督的致意），或是一位多年未见的从前博士

班学生对我的感激和爱戴，以及来自校方主管和旧生们对我的情感。

在你快要100岁时，回顾以往，你最自豪的是什么？

我一直努力不让自己骄傲。可是，有些事情令我非常满意，非常高兴。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遇到圣施礼华，能够认识他，聆听他的教诲多年，看到他对我的信任，让我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，尤其是在纳瓦拉大学。多亏了那个经历，让我发现自己在这个世上的位置和我生命的缘由。

你在马德里遇到他的吗？

是的，1939年10月，当他住在汉纳街的学生宿舍里时。那时他是个很年轻的神父，37岁，深爱耶稣基督和圣母。他很单纯，跟我们每个人都很亲近，从他的表情中，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份深厚的感情。他很重视我们的个人状况，教导我们对神父的尊重以建

立父爱，以及极大的信心，并鼓励我们改善我们的基督徒生活。

你为什么选择住在学生宿舍里？

是若瑟玛利亚·阿巴雷达教授邀请我去宿舍会见主业团的创办人。他是我在韦斯卡中学，高中最后一年的老师。我们在他的土壤科学的实验室里简单的实验中，实习协助他。我想我对科学研究的热情就是从那时开始的。尽管我们年龄有段距离，我们成为忘年之交。第二年，也就是1935 - 1936年之间，我们两人都搬到马德里。有好几个星期天，我们会一起散步，他带我参观这座城市。

内战期间，一切都瘫痪了。我不得不搬很多次家。从卡泰罗尼亚开始，最后搬到昆卡。于1938年，在萨拉戈萨见过阿巴雷达一次。他已经请求加入主业团。我印象深刻，因为当我们见面时，他告诉我他未来的准备。战争结束后，最重要的事情是让国家重建、变得更好，西班牙的科学界也需

要达到更高的水平。我后来才得知，在内战开始时，他的父亲和兄弟都在卡斯佩被杀，但他那时并没有跟我提起这件事。

冲突结束之后，他告诉我，他要搬到汉纳学生宿舍去住，我应该去那探望他。我喜欢那里的氛围，也开始参加一些由圣施礼华教授的基督宗教培育课程。1940年1月，他们为我详尽的解释了主业团。三周以后（1940年2月10日），当我向创办人表明要加入时，他对我说，他们为我的圣召祈祷了很多，特别是阿巴雷达教授。然后我搬进了宿舍；他们在已经有三张床的房间里又加了一张床。

目前的情况，与过去全然不同，你对现在在大学念书的人有什么建议？

他们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。要考虑到大学所传授给他们的教育，赋予未来力量，并将帮助他们开发更好的计划、服务更多的人。你对别人负有一份责任，浪费时间其实伤害到每个

人：家庭、社会和自己。所以千万不要变得自私。有些学生被训练成以自我为主的竞争个性，这是不好的，因为他们以后会变得苦涩。如果他们有交朋友，如果他们慷慨大方，他们会更加的快乐。

对老师们呢？

记得在一次学生联欢会中，一位老师问圣施礼华：「父亲，我能为学生们做些什么？」他回答说：「爱他们。」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如果你真的爱他们，你会给他们建议和帮助，即使你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要求他们。

你是在欧洲完成学业的，譬如苏黎世、弗莱堡……这在当时并不常见。

实际上，在那个年代，几乎所有读过研究所，并最终成为全职教授的人，都出国深造。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（1942年）完成了博士学位，我选择了瑞士，因为我有良好的科学背景，而且我没有参与战争。

我曾在著名的苏黎世理工学院从事过一段时间的动物营养学工作，之后去了弗莱堡医学院，在那里我专注于肠道吸收过程的研究，这是我在巴塞罗那大学和纳瓦拉大学研究的主要领域。出国是一件好事，因为你可以与那些你先前不认识的人建立关系，并可以接触到你感兴趣的工作领域和方法。

对一个来自西班牙的人来说，离开这个国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吗？

是的。我记得1961年参加莫斯科国际生物化学会议。俄国在西班牙还没有大使馆。我是在巴黎拿到了签证，当我们到达莫斯科的酒店时，我们的护照被拿走了。我承认，我很担心在游览这座城市时，会被要求证明自己的身份。例如，早上在过早的时间乘坐大众交通工具，就有点冒险了，因为我每天都想去那里唯一的天主教教堂望弥撒。

其他的西班牙人在出发前几天，护照就归还了，但我的却没有出现。可以理解的是，我已经开始想象：自己不能搭飞机、没有钱住酒店、没有外交代表、被拘留的可能性很大。最后，经过我的坚持，终于在酒店的护照名单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。原来护照是按照倒数第二个姓氏字母的顺序排列的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。

当纳瓦拉大学创立于像邦不隆那这样的省会都市时，你对它的国际拓展有何想法？

由于创办人独到的坚持，于1954年成立了医学院。我那时是巴塞罗那的教授，我很清楚，一切事都会解决的。在圣施礼华推动进行的计划中，他传递了全然的信心，我深信，如果他对创立纳瓦拉大学有兴趣的话，结果肯定会是很成功的。将会是一所优秀的大学。但我不知道它会成为欧洲排名第三或第四，仅仅落在牛津和剑桥之后

的学校，但它会成为一所优秀的大学。

为什么圣施礼华坚持要在邦不隆那设立大学？

我从来没有问过他这问题，伊斯梅尔·桑切斯·贝拉（Ismael Sánchez Bella，该校第一任校长）跟我说，他也没想到问这件事。我的想法是，一方面，在纳瓦拉和附近地区没有大学。此外，这个地区以笃信基督宗教而闻名；成千上万的纳瓦拉神父和修道人士，因他们在世界各地的传教工作而为人称道。另一方面，在所有教育和经济事务上都是西班牙最有自主性的区域。因此，纳瓦拉人或许最能够理解私立大学的存在。早在十九世纪就曾有人抱怨，为什么纳瓦拉没有一所大学。

1966年，圣施礼华邀请你成为校长。你对这个决定有什么反应？

我在巴塞罗那当了22年的教授，对我的研究工作和分配给我的教学工作都很满意，我也很喜爱我的学生，我试图给他们清晰而跟上时代的教育。

1966年3月，应届校长阿巴雷达去世。不久之后，我因为其他事情去了罗马，我有个机会看到圣施礼华。那时我才知道，他有意让我接承阿巴雷达做校长。面对如此重要的职位，我尽量避免表达我的恐惧。阿巴雷达是国际知名的学者，自西班牙高等科学研究机构（CSIC）成立以来，一直在该机构中担任要职。但是在目睹圣施礼华对我的信赖，我答说：「我在这里，无论需要我做什么。」

管理这所大学需要什么？

需要什么？一方面，需要非常多的平静（笑）。不要被任何事情吓到。平静，知道如何倾听，并与他人一起研究问题的根源，不要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不知所措，尽量不伤害任何人，最重要的是能同侪共治。在大学的共治

的制度中，校长主持会议，但他自认为只是众人中的一个而已。因此，你没有可能成为暴君的风险。这制度很健全，因为四只眼睛比两只眼睛看得更清楚，何况我们这里有二十只。所以有更多做出正确决定的可能性。此外，最重要的是，校长需要求助于天主和圣母的代祷。

在你身为校长的告别演说中，你说你唯一得做的事就是「让大学继续前进」，因为创校的一批校长们已经完成了困难的部分。

对于一所刚刚起步的大学来说，最重要的是风格、是精神。从一开始，这就已经是现实了。圣施礼华教导我们要以基督徒的方式生活和工作、彼此和睦团结、关心他人，尤其是那些受苦的人。其余要做的就是继续大学的自然发展：扩展校园、增加建筑、聘请教授，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情，同时努力确保创校精神的核心更日益发扬光大。

你是在1968年5月成为校长，那个年代许多欧洲大学经历了学生暴动，在这里并没有太多的反响。为什么？

我想说的是，这所大学的总体氛围就是工作、上课和接受培育。我认为那些年代的学生反叛的主要因素有两个。一方面，老师和学生之间有很大的距离；在教授上课的讲台和学生的课桌之间也有很大的距离。这里没有发生过这类的事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我们的学术当局可以出面，此外，学生代表也是他们通过投票自己选出来的。

另一方面，在其他的西班牙大学，或公立大学，他们反抗的理由几乎总是反对佛朗哥政权。这是一个简单的正当理由。但在这里，我们与佛朗哥政府的教育政策毫无瓜葛，也没有因此遭受多少痛苦。这里唯一的学生事件是1969年6月20日学生的静坐示威引起一些注意。二百多名学生聚集在校长的大厅里。没有骚乱或暴力。我们

听取了他们的要求，并作出了响应。示威结束之后，学生们连吃了三明治的垃圾都没有扔在地上，这已经相当难能可贵了！

你在纳瓦拉的这许多年中，你认为哪些是最好和最糟糕的时刻？

对我来说，最难忘的时刻是1967年10月。来自世界主要大学：哈佛大学、科英布拉大学、鲁汶大学、巴黎大学、慕尼黑大学和马德里大学的六位教授——接受了我们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。第二天，纳瓦拉大学之友协会举行聚会，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邦不隆那。这代表了伟大的精神支持；看到那么多人对这所大学的赞同与支持，真是令人惊喜。

圣施礼华也在校园弥撒里发表了「热爱世界」这篇著名的讲道。

当然！我想这是圣施礼华第一次公开的讲道。他自己也非常重视此事，因为在那个时候，一些人给主业团贴上

了与现实不相符的标签。于是他想在讲道中阐明主业团精神的关键特质。

在十月的那一天，作为主业团的创办人和纳瓦拉大学的创办人，圣施礼华成为了学术界、教会、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焦点，尽管圣施礼华一生都试图隐藏和消失。

那最艰难的时刻呢？

回忆艰难的时刻总是痛苦的……，曾经有一段时间，在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，民间对大学名额有庞大的需求，很不幸的是我们没有教室建筑来容纳那么多的学生。我们在声请获得合法的校园用地时，遭遇到严重的阻碍困难，所以我们无法增盖新教室。我们不得不在中央大楼里设置分隔栏。在三楼，为三百位法律系一年级学生设立了一间大教室。那几年是非常困难的……。

一般而言，最糟的时刻来自于反大学的态度，好像无知，或恶意的散播错

误信息；当然，我们这也不例外的遭受过恐怖分子的袭击。无论如何，最好的忠言是记住圣施礼华的教导：永远宽恕。

你已经到了一个值得尊敬的高龄，现在应该很有智慧了。你认为幸福是什么？

（笑）要感恩。要为这么多的事情感谢天主。当你真诚地感恩时，你就会快乐。尽管我有很多个人缺点，我希望天主以祂无限的慈悲，身为一位好父亲能接纳我，让我感谢祂为我所做的一切。

.....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
automatically from [https://opusdei.org/
zhs/article/wo-yi-sheng-zhong-zui-
zhong-yao-de-shi-qing-jiu-shi-ren-shi-
liao-sheng-shi-li-hua/](https://opusdei.org/zhs/article/wo-yi-sheng-zhong-zui-zhong-yao-de-shi-qing-jiu-shi-ren-shi-liao-sheng-shi-li-hua/) (2026年3月15日)